

【文学与艺术研究】

# 论五四小说中的转述语及其现代意义\*

马治军 晋海学

**摘要:**五四小说在转述形式上突破了古代白话小说的叙述格局,主要有四种形态:一是多种样态的直接引语,二是间接引语,三是自由直接引语,四是自由间接引语。五四小说中的转述语明显具有对话性质,它们频繁发生在人物内心、人物之间,以及人物和叙述者之间,是现代自我意识的真实呈现。五四小说的转述语中潜在包含着他人言语,它们之间交错对话,展现出杂语特色。现代主体在认知结构上的不足经由转述语呈现出来,这种不依靠奇妙情节产生的反讽修辞,有某种结构上的意义,更具现代性色彩。

**关键词:**五四小说;转述形式;叙述言语;杂语;反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0)05-0152-07

五四时期,小说创作彻底颠覆了古代白话小说的叙述模式,当人们将研究视野都聚焦在叙述时间或叙述视角等问题上时,其实忽略了另外一个与上述叙述特征本为一体的转述语问题。这或许有赵毅衡所说的我们本不敏锐于言语转述的原因,也或许有转述语问题自身影响力较小以致无法引起人们注意的原因。但毫无疑问的是,相对古代白话小说几乎清一色的直接引语来说,五四小说中的转述方式更加多样,其审美特征也更具现代品质,理应是五四小说“新”叙述模式的一部分。从国际的研究视野看,转述语问题自19世纪以来已受到人们的重视,巴赫金认为“转述”是人与人之间语言交流的重要媒介;热奈特提出对他人言语的转述是小说特有的语言现象:“任何一篇叙事文都不可能‘展示’或‘摹仿’它所讲述的事。它只能详细地、精确地、‘生动地’讲述,从而或多或少地造成摹仿的幻象,这才是叙事体的唯一的摹仿法。”<sup>①</sup>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我们可调整一下视野,去认真关注一下五四小说中被忽视的转述语问题。

## 一、五四小说中转述语的多元形态

人物言语的转述方式在古代白话小说中就已经出现。小说家们为凸显叙述的真实感,经常采用带有引导词和引导符号的直接引语形式,意在表明引语之内的话语都是人物自己所说,期望读者不要对全文的真实性加以怀疑。清末,梁启超积极倡导小说界革命,开启了古典小说向现代转变的序幕,吴趸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八宝王郎《冷眼观》、刘鹗《老残游记》等小说中,大胆使用带有间接引语的转述形式。这种叙述方式虽然还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但已是一种新的进展。五四小说在文学革命的推动下,对传统叙述方式进行全面变革,此一时期小说的人物言语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出现了灵活多样的转述方式。具体来讲,大致有如下几种类型。

### 1. 多种样态的直接引语

五四小说中的直接引语形式依然很多,但和古代小说已经有了质的区别。五四作家在使用上不拘泥于引导词的位置,引导词可随着叙述的流动,既能

收稿日期:2020-02-16

\*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生态文学理论的发展空间和实践路径”(2018BWX009)。

作者简介:马治军,男,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乡 453007)。

晋海学,男,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文学博士(新乡 453007)。

居前又可靠后,位置非常灵活。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为保证叙述的通顺流畅,许多作家更会省去繁多的引导词。如《孔乙己》中掌柜和酒客之间的对话:

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掌柜正在慢慢的结账,取下粉板,忽然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还欠十九个钱呢!”我才也觉得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一个喝酒的人说道,“他怎么会来?……他打折了腿了。”掌柜说,“哦!”“他总仍旧是偷。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先写服辩,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后来呢?”“后来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掌柜也不再问,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账。<sup>②</sup>

这段似问似答的对话发生在掌柜和酒客之间,为了避免读者误解,作家在对话的开端处用了引导词,但是在随后的一问一答中,作家大胆地省去不必要的引导词。这种省略引导词的直接引语形式在其他五四小说中也多有体现。

## 2. 间接引语

人物言语有主次之分,它们对人物形象的建构分别起主要作用和辅助作用,为了照顾叙述的流畅性,五四作家经常会对小说中起辅助作用的人物言语采用间接引语,这样既不影响人物形象的塑造,又可保持叙述流的运行速度,是一种新的转述形式。王统照《遗音》是主人公对他年轻时初恋的追忆,小说以第三人称的口吻缓缓启封这段人生际遇中“情海的波纹”,语言细腻感人。当主人公叙述他“很酸楚”的心、他母亲由于不同意而说出的“极坚决的话”,以及讲述“她”的“极凄咽而颤的音”时,作家均使用了直接引语,但是在上述核心内容之外,小说则多用间接引语。汪静之《伤心的祈祷》的主人公值翻在回城的船上偶遇少年时伙伴秋英,引起了他对逝去年华的种种追忆,最终却因感其变化之大而无法释怀。在小说的结尾,同乡无意间向他传递了秋英患重病的消息,却激起他强烈的情感回应:“他心里忽然生出一种恶魔的思想,他憎厌伊,愿伊便这样死了。”这是叙述者对值翻言语的抽象转述,而不是它的全部,为了避免读者在阅读上产生歧义,叙述者紧接着补充说:“他这思想里其实并未含着一丝恶意,与其说是残忍的恶意,无宁说是一种无可如何的

无助的伤心的祈祷。”<sup>③</sup>这里,作者关注的是值翻究竟会在怎样的情感程度上回应这个消息,他不需要人物话语的全部内容,而只关注值翻感慨的程度。从叙述效果上看,这段转述语虽然有叙述者浓重的声音,但是却准确传递了值翻的思想情感,显得言简意赅,有点睛之效。这种由间接引语形式所带来的叙述效果还体现在朋其《蛋》的第四节、冰心《遗书》的第十二封信等许多作品中。

## 3. 自由直接引语

五四时期的许多作家都喜欢用自由直接引语的形式讲述自己的思想或情感,转述语内容经常是人物内心意识的真实记录,与直接引语有很大不同。郭沫若《歧路》中的“他”为生计原因,决定让妻子带着三个孩子回日本生活,但是在送走他们之后,他的愧疚和自责之情却突然无尽地蔓延起来:

但是妻子们的悲哀是怎么样呢?朋友们的失望是怎么样呢?她怕我受累赘,才带着儿子们走了,她在希望我做长篇呢。每周的杂志,也好像嗷嗷待哺的雏鸟一样,要待我做文章呢。这是我死的时候吗?啊!太 Sentimental 了!太 Sentimental 了!我十年前正是拖着一个活着的死尸跑到日本去的,是我的女人在我这死尸中重新赋予了一段生命。我这几年来并不是白无意义的过活了的。我这个生命的炸弹,不是这时候便可以无意义地爆发。啊,妻儿们怕已过了黄浦了,我回去,回去,在这一两个月之内我总要把“洁光”表现出来。<sup>④</sup>

上述这段内心独白是“他”的潜意识活动,主要是对妻子的愧疚之感,从当前的“怕我受累赘”,想到“希望我做长篇”,再想到十年前他对他的生命拯救,整段没有受到叙述声音的干扰,非常顺畅地完成了对人物言语的原味呈现。黎烈文《舟中》的“我”对自己思想的忏悔,叶灵凤《女娲氏之遗孽》中“我”对蓓箴的系恋与思索,白采《被摈弃者》中“我”对“他”的各种幻象与猜测,也都是依托自由直接引语来转述的。

## 4. 自由间接引语

在上述几种形式之外,五四作家使用较多的还有自由间接引语,这是他们兼顾小说的启蒙效果与尊重人物个性的必然结果。这种形式虽然由叙述者直接转述,但却是站在人物的立场之上发言的,有人物主体的个性特色,所以,这是一种混合语。叶圣陶

《前途》中惠之因战争停课停薪,他期待好友陈伯通能帮助推荐一份工作,小说写他在邮寄信件之后,看到路旁鱼摊时的憧憬之情:“在他脑中显现一只精瓷的菜碗,绝清的汤,玉兰片和茶腿盖在汤面,底下是一尾嫩熟的鲫鱼。联带显现的是一把点铜锡的暖酒壶……”<sup>⑤</sup>“一尾清嫩鲫鱼,一壶‘陈绍’”是惠之内心喜悦之情的流露,他相信这些画面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他的生活里,但是这段话是由叙述者说出来的,是叙述者对惠之的思绪做出的一次认真整理。台静农《天二哥》中小柿子打了天二哥两拳,作者采用第三人称叙述来表达天二哥的不满和愤怒:“这两拳是小事,但在天二哥身上却是从来就没有驮过别人的拳头;虽然十几年前挨过县官的小板子,那是为的蒋大老爷告他游街骂巷的罪过。但是这只能县大老爷和蒋大老爷可以打他,这小柿子又怎配呢?这耻辱,当然他是受不了,于是他发狂,他咆哮地赶来。”<sup>⑥</sup>这一转述形式独特的叙述功能吸引了许多五四作家,鲁迅、郭沫若、叶圣陶等都不同程度地在他们的小说创作中使用这一形式。

当然,五四小说中的转述语现象绝非像上述所说的那样单调,而是经常以混合形式出现的。如叶圣陶《潘先生在难中》潘先生一家逃难到上海后,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作家先后采用自由直接引语、自由间接引语以及直接引语的混合形式来表达;潘先生从上海突然回家,让王妈惊讶不已,作家又使用间接引语与直接引语的形式进行表达,其间转承非常自然。郭沫若《万引》中松野偷到一本自己喜爱的书,在即将面对自己的夫人时产生了复杂的心情,作家以自由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间接引语和直接引语的混合形式,详细记下人物内心意识流动的轨迹,叙述过程非常流畅。

多样的转述形式在五四时期集体亮相并不是偶然的。现代叙述者的出现让五四小说的叙述模式发生多方面的现代转向,受此影响,转述形式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直接引语中,人物主体开始发出真正的声音,引导词的位置可以根据叙述要求自由安排,甚至省去,呈现出相当大的灵活性。间接引语在清末小说中零星点缀式地出现之后,开始被五四作家频繁使用。两种自由式引语是五四小说中新出现的事物,胡亚敏曾说:“鉴于自由直接引语在表达上的灵活和自由,因而它备受现代作家的青睐。”<sup>⑦</sup>申丹认为:“自由间接引语是现代小说中人物话语表达

的重要方式之一,具有多种特殊表达功能。”<sup>⑧</sup>自由直接引语善于凸现人物内心的意识活动,自由间接引语则长于人物心理的理性分析,这两种自由式引语都是现代小说主要叙述特征的表现,正是它们的存在让五四小说和古代小说有了显著区别。

## 二、五四小说中转述语的对话特征

就总体而言,我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转述语是“单声语”。“说书人叙述者”具有绝对权威,人物主体在这种叙述格局中无法获得真正独立,人物言语虽然被放进带有引导词标记的直接引语当中,但有些转述语全部是叙述者的声音,人物主体没有表达的权利,更不会有自己的声音。所以,古代小说中的直接引语只是形式意义上的直接引语,全书只有叙述者的一个声音。

晚清小说家已经认识到古典小说叙述模式的局限:“我国小说体裁,往往先将书中主人翁之姓氏、来历,叙述一番,然后详其事迹于后;或亦有用楔子、引子、词章、言论之属,以为之冠者,盖非如是则无下手处矣。陈陈相因,几于千篇一律,当为读者所共知。”<sup>⑨</sup>遗憾的是,他们虽有意识革新,但收效甚微。五四作家承接晚清小说家的变革意识,却比他们更坚决。五四作家在理论上强调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在创作中推崇具有个性的作家的感情。他们已不认同“说书人叙述者”的权威叙事,而是一方面强调“记叙文应以不露作者面目为正宗”,另一方面反对“作者对于读者的专制态度”<sup>⑩</sup>。受此影响,五四小说中的各类主体逐渐取得相互独立的权利,为彼此之间的对话交流提供了可能。正如巴赫金所说,“用何种形式表现他人言语,如何嵌进说明他人言语,这两方面表现了一个统一的东西,即对他人言语采取一种对话态度;正是这一对话态度,决定着转述的整个性质,以及转述时所出现的一切意义和语气上的变化”<sup>⑪</sup>。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小说中的转述语是有对话性质的。

第一,人物之间的对话有了双声性质。人物之间的一问一答本身就含有对话因子,而更关键的是说话人在问答过程中已受到他人言语的影响。郑振铎《书之幸运》的主人公仲清嗜书如命,他想购买天一书局的《浣纱记》《隋唐演义》与《隋炀艳史》三本书,但是又嫌老板要价太高,他们之间有一段讨价还价的对话,双方的言语中都包含有两层意思:

“书实在不坏,只是价钱太贵了,不让些是难成交的。这种玩玩的书,我倒不一定要买,如果便宜了,便买,贵了,犯不着买,只好请你们送到别家去吧。”

老板道:“价钱是实实的,一个也不能让。不瞒您说,隋唐演义我是花了二十五块钱买下的,浣纱记是我花了四十块钱买下的,隋炀艳史却花了我五十块钱……我辛苦了一场,二三十块钱,您总要给我挣的。这一次您别让价了。下次别的交易上,我们吃亏些倒可以。这次委实是来价太贵,不能亏本卖出。”

他明晓得秃头老板说的是一派谎话,却不理会他,假装着不热心要买的样子,说道:“那末,请你的伙计明天到我公事房里把头本拿去吧。太贵了,我买不起。”<sup>⑫</sup>

仲清的每一句话都是在和老板讨价还价,所以,他要想尽一切办法伪装自己的真实想法,生怕对方看懂他的心思而不愿意降价。老板知道仲清喜欢书籍,也想借此卖个好价钱,因此,他的每一句话都围绕仲清展开,他对购书原价的客观描述,已推送出为他人考虑的忠厚形象,实则是为了有利于买卖的成交,而避免将自己引向尖刻的传统商人形象中去。总之,五四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对话不是简单的问答体,双方主体经常以对方的态度为思考前提,让对话呈现出浓郁的双声性质。

第二,人物的内心独白中有了对话的声音。内心独白是“人物内心没有说出来的思想过程”<sup>⑬</sup>,思想者常常会因为一件事情而忧心忡忡,他无法向其他人寻求交流,只能面对自己,将自己分裂开来,在两个自我之间展开对话。如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的一段内心独白:“这是爱吗,也许爱才具有如此的魔力,要不,为什么一个人的思想会变幻得如此不可测!当我睡去的时候,我看不起美人,但刚从梦里醒来,一揉开睡眼,便又思念那市侩了。”<sup>⑭</sup>在这篇日记中,莎菲始终都在因为凌吉士的存在而纠结着自己的感情,她将“爱情”本身作为神圣之物,凌吉士因为沐浴了“爱情”的光环,而变得光芒万丈,“美人”“骑士”都是莎菲赋予他的昵称,她把对凌吉士的爱慕看作是对神圣“爱情”的追求。然而,莎菲还有另外一个低调、客观、真实的自我,她聚焦于现实生活中的凌吉士,不断揭露他的各种齷齪和卑劣之处。莎菲充满主观浪漫的第一个声音,和

清醒理性的第二个声音,共同存在于她的内心之中,但它们之间不可调和,谁也说服不了谁,给莎菲的这篇日记带来了吸引人的力量。

第三,叙述者和人物之间有了对话的可能。西摩·查特曼曾说:“人物的言语行为从逻辑上区别于叙述者的言语行为。即使人物在讲述故事内部的一个故事,他的言语行为也总是栖止于故事,而不是栖止于主要话语。像他的其他行为一样,它们直接与其他人物互动,而不是与受述者或隐含作者互动。”<sup>⑮</sup>在这两个不同的叙述层次中,叙述者和人物各司其职,似乎没有交集,但五四小说中的某些片段,却让他们之间有了对话的可能。

黎烈文《决裂》中“他”由于无法缴纳学费而向父亲求救,但父亲的所作所为却激起了他内心的反感:“他见了她,定要将她搥一个死,才能出一点怨气,他怎能反去低声下气的向她纳降呢?他这时听了他父亲的话,他真的想报他一大口唾沫。”<sup>⑯</sup>“她”指的是父亲的二房蔡金玉,“他”认为蔡金玉是父亲抛弃“他”和母亲的罪魁祸首,所以,“他”无法和“她”达成谅解。“他”的内心始终有两个声音在缠绕,一个是为了学业要忍辱负重的声音,一个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和“她”妥协的声音,但是在它们之外,还有一个不被人注意的声音,一直在默默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并伺机对“他”的行为做出道德干预。不过,和传统的叙述干预不同,这一声音没有站在叙述者的立场上发表议论,而是悄然融入人物言语当中,通过第二个声音,表达出对“他”想要妥协这一行为的强烈谴责:“他怎能反去低声下气的向她纳降呢?”尽管这一声音是面向读者而发,但它更像是叙述者和“他”之间的对话,是叙述者借用“他”的第二个声音对“他”的严厉批评。

巴赫金曾说:“具有内在说服力的话语,是现代的话语,是在同没有结束的现代打交道的区域里诞生的话语,或者是加以现代化了的话语。”<sup>⑰</sup>古代小说中的直接引语受到权威叙述者的束缚,人物自我意识很难产生。五四小说的转述语突破了这一局限,人物从传统“说书人叙述者”的控制中独立出来,认识到自己的言语和他人言语之间的关联,并以理性的思考从他人言语中识别出自我,发出具有自我意识的“呐喊”。在这层意义上,对话性质是五四小说转述语的主要特征,它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们各种意识的复杂存在,是现代人生活的真实反映。

### 三、五四小说中转述语的修辞效果

古代白话小说发展到五四时期已经延续千年之久,它们之所以能在如此长的时间跨度里保持平稳发展,的确有其高明之处。从整体而言,古代小说的修辞效果主要得益于巧妙的情节安排和布局,文本的修辞效果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作者的精妙构思。五四小说中转述语已具有现代对话性质,它们的存在有可能让小说的修辞不再单纯依靠故事的情节产生,而是从言语本身出发,让小说的修辞效果呈现出一种新的特征。

#### 1. “杂语”

巴赫金认为:“对于生活在语言之中的人的意识来说,语言并不是用规范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抽象的系统,而是用杂语表现的关于世界的具体见解。所有的话语,无不散发着职业、体裁、流派、党派、特定作品、特定人物、某一时代、某种年龄、某日某时等等的气味。”<sup>⑮</sup>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的杂语当中,但只有在现代意义上的人出现之后,这一意识才能被感知。五四小说中的人物已经独立,转述语在此已经成为由各类言语所组成的杂语世界。作家不仅看重他们每个人所说的话,而且重视这些言语所携带的社会语境,五四小说因为它们的存在而容纳了丰富的社会内容。

周全平《呆子和俊杰》中 C 君为人直率,不会委曲求全,成为世人眼中的“呆子”,他想变得圆融,但却苦于一直学不会,于是他责备自己:“为何那时我再也按不住自己的火气呢?我不是想对于有力的人表绝对的同情吗?我不是想要使他人称许为识时务的俊杰吗?”<sup>⑯</sup>成为他人眼中“识时务的俊杰”可以看作是一个时代的社会里,普通人对人生价值的通俗理解,但并非 C 君的价值判断。人生的挫折让 C 君屈膝于这个人生信条,然而这一人生信条自有它的运行体系,C 君要想“成功”,就必须在行为上自觉遵守它的各种规则。从表面看,“识时务的俊杰”这样一种人生标准的声音,影响了 C 君的意识,构成了小说的杂语现象。从深层看,作家其实揭示了作为现代主体成长的艰难和焦虑,即他们的独立不仅仅体现在与传统的直接对抗上,而且体现在无法冲破种种无形的观念束缚上。正是由于这些社会杂语的存在,使小说的人生书写由对个体的批判转向了对社会的批判,从而具有了深刻的力量。

《阿 Q 正传》中的阿 Q 情况更加复杂,他虽然是未庄的一名普通短工,但言语里却总夹杂着与其身份不相符合的声音:王胡扭住阿 Q 的辫子要打,他赶紧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小尼姑骂阿 Q“断子绝孙”,他忽然想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若敖之鬼馁而”;阿 Q 被绑缚刑场,无师自通地喊出:“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这几段话语均有明确的历史语境,前两个是传统文化经典中的著名引文,后一个是古代囚犯临死之前的壮语,它们通过阿 Q 的转述声音进入文本内部,构建了小说名副其实的杂语系统。与此相适应,小说的批判也就不再仅仅是小说中的人物和未庄社会,而是具有了更大的现实力量。

“杂语”的使用体现了五四作家对小说真实观的追求。与古代小说相比,五四小说对“真实”的理解已有很大不同,如果说前者追求的是事实(材料)上的真实,那么后者寻觅的则是作家思想情感上的真实。“作品里所描写的事实,应当是作者底经验、思想、情感、想像等底范围以内的,不可虚伪,不可作假。”<sup>⑰</sup>“作者底经验、思想、情感、想像”当然不是虚空的存在,而是存在于杂语般的语言形式之中。“语言作为社会思想的真实而具体的存在,作为杂语的见解,对个人的意识来说,正处于自己和他人的交界线上。”<sup>⑱</sup>可以看出,“杂语”和小说的真实性有着并不引人注意的潜在关联,它是转述语带来的修辞效果,也是五四小说对真实性追求的实践体现。

#### 2. 反讽

五四小说中转述语的对话性质不仅仅体现在相互和谐的交流上,还体现在因观点不同而造成的冲突和矛盾上。就后一种而言,当某一种声音受知识的局限而表现出某些不恰当的行为时,往往会遭到另外一种声音的嘲笑或者讽刺。考虑到这些冲突和矛盾均发生在转述语声音的内部,所以,我们无法在转述语之外寻找其他原因,与古代小说情节性的反讽修辞不同,这是一种结构意义上的反讽修辞。《阿 Q 正传》中的转述语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这王胡,又癞又胡,别人都叫他王癞胡,阿 Q 却删去了一个癞字,然而非常藐视他。阿 Q 的意思,以为癞是不足为奇的,只有这一部络腮胡子,实在太新奇,令人看不上眼。他于是并排坐下去了。倘是别的闲人们,阿 Q 本不敢大意坐下去。但这王胡旁边,他有什么怕呢?老实说:他肯坐下去,简直还是抬举他。<sup>⑲</sup>

这是阿 Q 坐在王胡旁边的一段自由间接引语。对于受过赵太爷和闲人们欺负的阿 Q 来说,他早已在众人面前失去做人的尊严,但他一直坚持不懈地用精神胜利法找回失去的面子。对于王胡他优越感十足,但这种优越感到底有多大,他并不真正知道,他需要有一种坚定的他人言语承认他优于王胡。在末尾的转述语中,阿 Q 的内心意识已经分裂成两个声音,一个是胆怯之声,另一个是鼓励之声。“倘是别的闲人们”这句话已经表明,在未庄的等级社会里,王胡不是居于中间位置的“闲人们”,这对于经常受那些“闲人们”欺负的阿 Q 来说,他不用再担心王胡会像他们一样欺负他,这无疑是个很好的消息。但问题是,阿 Q 意识中的鼓励之声无法替代现实生活中的他人话语,这个他人话语就是未庄社会的等级话语,所以,尽管这一声音给予阿 Q 很大鼓励,但效果并不显著,因为阿 Q 更想得到他人话语的认可,即未庄话语秩序的认可。换言之,阿 Q 希望在这件事情上获得未庄话语权威的认定,即他坐在王胡旁边是合法的。叙述者的悄然介入解决了这一难题,他以外来者的身份接过鼓励的声音,仿佛是他人话语的降临,他一边反问阿 Q:“但这王胡旁边,他有什么怕呢?”一边向阿 Q 呼吁:“他肯坐下去,简直还是抬举他”,一举驱散了阿 Q 内心的犹豫。

这些言语都是阿 Q 内心的声音,它们以不同的面貌呈现在阿 Q 的意识当中,没有越出他的自我意识之外一步。在这层意义上,他人言语根本就不是现实等级话语的真正代表。转述语在这里制造了逼真的模拟,它的逼真性让阿 Q 相信他的行为已得到权威话语的认可,但事实上促使他做出决定的还是他自己。阿 Q 最终遭到王胡的暴揍,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反倒把责任推到日益减弱的权威话语身上:“他现在竟动手,很意外,难道真如市上所说,皇帝已经停了考,不要秀才和举人了,因此赵家减了威风,因此他们也便小觑了他么?”<sup>②</sup>经过这段话语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阿 Q 尽管处于底层的身份,但是作家并没有从他的胸无点墨的文化程度上打主意,而是将他在认知结构上的缺陷通过转述语大胆地暴露出来。从这一点看,小说的反讽修辞不因情节而生,所以,它反讽的对象就不再仅仅指向小说的主人公阿 Q,而在更大程度上指向了具有像阿 Q 那样认知结构的现代人。

与《阿 Q 正传》不同,叶圣陶的《一包东西》展现

的是另一个维度上反讽修辞。小说全文几乎都是关于它的主人公一名“校长”的转述语,这位“校长”准备坐车回校,正好碰见同事老李,老李托他捎了一包东西,但没想到正好撞见警察的检查,他唯恐这是一包装有反动宣传的东西,所以,他跳下车之后踏上黄包车就走,一路上都担心被警察撵上,一路上都在揣摩包裹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他自信已经知道这一包是什么东西了,比解开看还要清楚。多年来老李干的什么事业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他手里揣带的东西,还有别的吗?不是制服魔的方略,便是他们罪状的宣告书。现在这一包,方方的,是坚厚的纸张,那一定印着一个横倒的非常难看的尸体,胸口有模糊的一滩;就是新近给魔残害了的一个。<sup>③</sup>

这段转述语中始终有两个声音在干扰“校长”,一个是居于弱势的声音,它认为这是一包正常的物品;另一个是强势的声音,认为这是一包反动的宣传材料。叙述者没有从外面干预人物言语,而是介入主人公的意识当中默默观察,他虽然不发表直接的建 议,但有着明显的情感倾向。虽然最终的结果让主人公大失所望,但是在这段转述语中,由于叙述者理性立场的参照,主人公在认知结构上的主观缺陷已暴露无遗。叶圣陶把小说主人公内心杂乱的言语梳理得整整齐齐,不似人物意识的自觉流露,作家借助人物内心的理性表达,以转述语的方式展现了现代主体在认知上的缺陷。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杂语”和反讽是转述语产生的较为明显的修辞效果。就前者而言,五四作家已普遍明白不可能有纯粹的人物言语存在,他们的声音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混合音,是潜在地包含了他人言语的存在。所有的转述语,哪怕是直接引语,都无法保证所引言语的纯洁性。所有这些,决定了现代小说已不可能再像传统小说那样,只有叙述者的独白,而是充满了多种声音、多种语调的杂语般的众声合奏。就后者而言,五四小说中的杂语性质,凸显了现代主体在认知上的有限性。既然权威已经成为历史,那么,依靠人类主体知识性不足而产生的反讽修辞也就失去了合法基础。而转述语的现代形式依靠其对话性质,展现了现代主体在成长过程中的认知问题,由此所呈现出的反讽修辞不再将其对象限制于某一位个体,而是将其面向认知结构本身,反讽因此也成为现代小说中一个重要的存在。

#### 四、结语

五四作家变革传统叙述模式的资源来自西方小说,较多人的西方留学经历可能更有益于拓展五四作家整体的知识视野。他们对西方小说理论的自觉学习,既可对古代小说的种种弊端一语中的,也可对清末小说变革的失败经验提出批评。如周作人在考察清末文学的译介问题时就说:“除却一二种摘译的小仲马《茶花女遗事》托尔斯泰《心狱》外,别无世界名著。其次司各得、迭更司还多,接下去便是高能达利、哈葛得、白髭拜、无名氏诸作了。这宗著作,果然没有什么可模仿,也决没人去模仿他;因为译者本来也不是佩服他的长处;所以译他。所以译这本书者,便因为他有我的长处,因为他像我的缘故。……不肯自己去学人,只愿别人来像我。”<sup>⑤</sup>倡导“模仿他”式的翻译,即是要求五四作家“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有如此清晰的理论诉求的当然不止周作人一人,沈雁冰、郁达夫、瞿世英、吴宓等也都有相似的追求。在这样的理论氛围下,五四作家很难再萌发向传统学习的想法,而纷纷转向西方现代小说,期望从中学到更能表达新思想的艺术形式。五四小说中转述形式的变革离不开这一背景,由于新的转述形式无法产生于传统,所以,它的每一种形态的出现,都可看作是作家向西方现代小说学习的结果。

但是从价值层面考虑,五四小说中的转述语则又必须和古代小说发生关联。前文曾述,五四小说的转述语充分体现了言语民主,无论是在多种样态的直接引语当中,还是在各种自由式的引语当中,言语主体之间的交流都呈现出鲜明的对话色彩,体现出相互尊重、相对平等的人格姿态。这种姿态有力

地解构了古代小说中“说书人叙述者”的权威性,让五四小说在尊重不同言语主体话语权的同时,出现了多声部现象,进而使小说在话语层面具备了现代民主意义上的“杂语”性质,这正是五四小说与传统小说根本的区别之处。换句话说,五四小说转述形式的价值是通过古代小说转述方式的纠正,以及在对古代小说叙述模式的突破中产生的,这意味着,转述语的现代价值无法由它自身呈现,我们只能依靠它对传统小说反抗的程度去评论它的历史贡献,去界定它的现代价值。

#### 注释

- ①[法]杰拉尔·日奈特:《论叙事文话语——方法论》,张寅德:《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61页。②③鲁迅:《鲁迅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23、74—75、76页。④⑥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316、399页。④⑩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37、325页。⑤叶圣陶:《叶圣陶代表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8页。⑦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6页。⑧申丹:《对自由间接引语功能的重新评价》,《外语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2期。⑨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94页。⑩⑫⑮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二卷(1817—192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10、342、57页。⑪⑰⑱⑲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24、130、72、72页。⑫⑯⑳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476—477、495、140页。⑬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77页。⑭丁玲:《丁玲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页。⑮[美]西摩·查特曼:《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徐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9页。

责任编辑:采薇

### Study on the Reported Speech and Its Modern Significance in the May-4th Novels

Ma Zhijun Jin Haixue

**Abstract:** The May-4th novels broke through the narrative pattern of the ancient vernacular novels in the form of reporting. There are mainly four forms: direct speech, indirect speech, free direct speech and free indirect speech. The reported speeches in the May-4th novels are obviously conversational in nature. They frequently occur in the inner world of the characters, among the characters, or between the characters and the narrators. They are the true representation of modern people's self-consciousness. The reported speeches in the May-4th novels potentially contain speeches of other people with interlaced dialogues, which display the miscellaneous language characteristic. The deficiency of the modern subject in the cognitive structure is presented through the reported speech. This kind of ironic rhetoric which does not depend on the wonderful plot has some structural significance and has a more modern color.

**Key words:** May-4th novels; reporting form; character speech; narrative speech; miscellaneous language; irony